

对柏拉图正义观的解读和当代审视

李耀锋

摘要：正义观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永恒主题，而他的正义观追求的核心主旨则是个人内心秩序的平衡和城邦等级秩序。按照柏拉图正义观的思想，他的理想国是由社会分工不同的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组成，各司其职，达到国家和谐。为了实现理想社会秩序，使统治者、护卫者更好地履行职责，必须采取教育，实行公有等手段。柏拉图的正义观与个人所处的时代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其正义观之秩序诉求对后世及当代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正义观；秩序

作者简介：李耀锋，男，讲师，法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社科部，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5）03-0105-04

柏拉图的三篇巨著《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勾绘了他的法哲学思想体系。任何断章取义地对柏拉图法哲学思想的解读，都可能产生不当的诠释。但是，人们如果没有对《理想国》中正义观的细致研读和深刻领会，则可能完全迷失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桃花源的池塘中，从而无法了解柏拉图《理想国》的主旨及其整体框架。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正义观是其心目中的秩序观，通过个人内心秩序平衡和城邦等级秩序安排，构筑了柏拉图一生对正义的孜孜追求。

一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正义观即秩序观。正义，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好份内工作，不去干涉别人的事；正义包括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柏拉图认为，正义观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一种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各司其职所构成的等级秩序社会。

在《理想国》开篇的第一卷，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的辩论围绕着“何谓正义”而展开。正义不是实话实说，也不是有借有还，而是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这是对正义的阶段性定义。进而，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的争辩引入到“谁之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对色拉叙马霍斯正义即强者的利益这一判断做出反驳，苏格拉底认为，正义不是强者的利益，也就是说正义不是拥有强权的政府的利益。由“谁之正义”到“何种正义”的辩论，呈现了正义仍然是一个难以言说并且充满争议的词汇。就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正义而论，正义也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情形。在《理想国》第四卷，对“何谓正义”的扣问再次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我们一直以某种方式在讨论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自己却始终不知道我们在谈论着它。”^[1]

最后，柏拉图引出了正义的核心意义：“每个人都必须做好份内工作，不去干涉别人的事。”^[2]并提出两种正义的形态：一种是个人的正义，另一种是城邦的正义。相比较而言，“城邦的正义大于个人的正义。”^{[1](57)}“城邦的正义是指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1](154)}“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1](155)}在这里“自己的事”，依柏拉图看来，就是社会成员的特定职责，这一特定职责是按照等级结构秩序来划分的。一些人拥有发号施令的统治能力，另一些人能够帮助掌权者达到目的。柏拉图的正义观是以人生而不平等来阐述其理想社会秩序的。

柏拉图所建构的理想社会秩序是由不同社会成员分工合作形成。这些社会成员虽然都出于尘土，但由于所加入的金属元素成分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加入黄金成为

统治者,加入白银成为护卫者(军人),掺加了铜、铁则成为农民、手工业者。即使形成这样的社会秩序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社会成员仍然可能存在一定的流动性,诸如在代际之间存在上层统治者后代向下层生产阶级流动的可能,下层生产阶级后代也可能向上层统治者流动。柏拉图认为大的正义是一种等级社会秩序,它的最高层是统治者,第二层是辅助者,最底层是生产者。这一正义的社会秩序一旦组成,各个社会成员应当按照自己的分工各安其分,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国家的一条总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1](154)}

柏拉图又认为,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个人是缩小的国家。“个人的正义就是城邦(国家)正义的缩影,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1](172)}“正义在大的方面是城邦(国家),小的方面是个人身上的正义:仅就正义概念而论,二者毫无区别。”^{[1](157)}柏拉图认为,对于个体而言,正义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人具有理性,支配人行为的是灵魂。灵魂分为三部分:激情、理性、欲望。理性最高,是智慧的品德;激情次之,体现了勇敢的品德;欲望最差,体现了贪婪的品性。正是根据灵魂分类的理论,他把社会民众(不包括奴隶)划分为三个相应的社会等级。而“对于个人,自身内的各种品质(激情、理性、欲望)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即正义。理智既是智慧的,是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的,激情应服从和协助它。二者既受到这样的教养、教育并被训练了真正起自己本分的作用,它们就会去领导欲望。”^{[1](169)}最后,他认为:“一个正义的人,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心灵的各个部分各起各的作用,领导的领导者,被领导的被领导者。”^{[1](171)}而“不正义是三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相互管闲事和相互干涉。”^{[1](173)}总之,一切的邪恶,正是三者的混淆与迷失。柏拉图对秩序的追求在他的《斐德若篇》中展示了人类的这一状况,他描述了一个驾驶着两匹马拉的车的人。一匹马,柏拉图说,是好的,“不需要动鞭子,而只需言语和告诫来引导”,另一匹马是坏的,是一个“无礼傲慢的同伴……”只屈从于鞭子和马刺。虽然驾驶者对于将来往哪里看得很清楚,并且好马在正确的轨道上,但是坏马“猛烈前冲跑去,给它的同伴和驾驶者造成了各种麻烦”。柏拉图从这一图景生动地展示了对秩序的破坏。只有驾驶者牢牢地控制着马匹,在驾驶者与马匹之间才能有秩序。类似地,只有我们的理性部分牢牢地控制我们精神和欲望的部分,人类灵魂才能达到秩序与和平。^[3]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先探讨城邦的正义,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由大见小。”^{[1](57)}通过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相互对照,相互明证,充分显示了柏拉图正义观的本源意义,即他的秩序观思想:自身的平衡有序,国家成员的各司其职的等级秩序。

二

柏拉图向往的正义观就是对理想社会秩序的一种追求,这种诉求是按照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各自的分工,各尽其责来实现的。为了使处于社会秩序中的不同成员达到理想国的要求,柏拉图对他们分别进行了身份的设定,并提出实现的手段。

(一) 统治者是哲学王

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并且他们将被赋予绝对的权力,合理地、无私地运用这种权力来为国家谋利益。作为统治者的哲学王近乎圣贤,天生具有最美好的道德品性、理性和智慧。柏拉图认为,真正具有品性的哲学家应是“眼睛盯着真理的人;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1](228)}他们的天性是“爱实体的知识,爱‘真’。”^{[1](230)}“要有良好的记性”,^{[1](233)}同时,“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是哲学家的天赋。”^{[1](244)}“最优秀的哲学家于世无用,它的无用其责任不在于哲学家本身,而在于别人不用哲学家。”^{[1](236)}“群众对于哲学恶感的根源在于伪哲学家身上。”^{[1](252)}也许正是由于个人的人生经历,在实现自己的愿望时屡次碰壁,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怨恨现行的政治制度,因为“其中没有一种是适合哲学本性的。哲学的本性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而堕落变质的。”^{[1](248)}

(二) 培育统治者、护卫者的重要路径是教育

柏拉图认为,教育是国家大事中最大的事,其关键就在于它是培育统治者、护卫者的重要路径。在

他设计的理想国中，护卫者（军人）和完善护卫者（哲学王）必须而且应当接受教育，妇女应和男人接受同等的教育，妇女可以成为统治者。并且他还指出，能够接受教育的仅限护卫者（军人）和完善护卫者（哲学王）两个阶级，而占城邦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者根本无权享有受教育权。为了使护卫者（军人）的心灵达到和谐，并且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心灵中的理智和激情，对护卫者进行音乐和体育教育，“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1](70)} 护卫者从童年起就应接受严格的体育训练以至一生。为了使完善护卫者（哲学王）摆脱可见世界，达到可知世界中的实在，在教育的内容上还得加上算学、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和辩证法，认为“几何学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1](291)} 为了强化教育的效果，还得审查故事、篡改历史和禁止诗歌、戏剧进入城邦。

（三）公有性是理想社会秩序的根基

在护卫者阶级（包括军人和哲学王）中实行一切公有性，是实现其各司其职的有效手段。其内容包括：“女人应该归男护卫者共有，儿童也都公有。”^{[1](132)} “男人女人同吃同住，没有任何私有财产（除绝对的必需品）。 ”^{[1](130)} 在上层等级人员中没有个体的家庭，他们的一切生活所需都由下层生产阶级成员供奉。柏拉图共有思想的目的，是摒弃世俗社会对统治者阶级、护卫者阶级作欲望的诱惑，从而使其能够贡献全部精力于公共职务，最终达到理想社会秩序的实现。而生产阶级的成员，则被准许在政府的严格监督下建立家庭，并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另外，在柏拉图看来，谎言“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1](88)} 而这仅仅是“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1](88)} 使用“谎言”就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特殊手段。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统治者年纪大一些，被统治者必须年纪小一点的。护卫者是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的人。最好的农民是最善于种田的人。”^{[1](124)} 由于分工，“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1](60)} 在理想园里，“一个人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在一个像是古代埃及或印加人的王国那样世代代毫无改变的国家里，一个人的工作就是他父亲的工作，这样便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在柏拉图的国家里，没有人有法律上的父亲。因此，他的工作要么是由他兴趣所决定的，要么就是由国家来判断他的才能而加以决定的。后者显然就是柏拉图所愿望的。”^{[2](155)} 在柏拉图的三种社会成员身份的设定下，特别是对统治者和辅助者采取培养、教育等各种手段，使他们具备应有的素质，能够承担各自的职责，国家应有的理想等级社会秩序也就形成，他的正义观才有可能实现。

同时，柏拉图认为，“美德是一种，邪恶却无数。”^{[1](175)} 一个理想的等级社会秩序建立了以后，王制是理想的政治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政体。有五种政体，就有五种灵魂。王制即善制，恶制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第二种是寡头政制；第三种是民主政制；第四种是僭主政制。还有别种政治：世袭的君主国、买来的王国以及介于其间的各种类似的政治制度。所谓的王制即王政或贵族政治。柏拉图指出，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与好胜争强、贪图虚荣的人相对应，不是一种好的制度。“民主政治国家的最大优点是自由”，^{[1](339)} “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极权政治的需要。”^{[1](340)} “在民主国家里比在寡头国家里更为强暴。”^{[1](343)} 因此民主政治也不是一种好的制度。由财产资格决定统治权力的，叫寡头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由于寡头统治者对财富的占有欲望，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僭主的天性是永远体会不到自由和真正友谊的滋味的”。^{[1](359)} “处于僭主制的心灵，充满了混乱和悔恨。”^{[1](362)} 看来僭主政治也不是好的制度，而王制或贵族政制是以统治者、护卫者、生产阶级所构成，各司其职责互不僭越，国家的目标就能实现。柏拉图认为，“这样的国家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在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1](133)} “国家的和谐发展就是各司其职。”^{[1](134)}

三

在柏拉图的思想中，“他的正义理论是精致的，并且成了他的哲学大厦的一块基石；这个理论在他

一生中大致没有改变过。”^[4]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观,主旨是在善的理念统摄下建构一个坚固的社会等级分层体系,其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我们摒弃了其中的等级观念,仅就正义是追求或维护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这一命题而言,柏拉图的正义观对后世以及当代的启示却值得我们深思。由于正义的实践本性,当我们追求公平正义的时候,对正义的一种本来面目——社会应有的秩序的探寻和解读,可以获得现实启示。当人们在追求公平正义的时候,公平语词的声浪可能掩盖了正义的本来面目——社会应有的秩序,这将使我们对正义的追求迷失其应有的方向。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是我们党在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执政理念之一。而这就需要把追求正义的本源含义——追求或维护社会应有的秩序,作为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的基点之一,同时也融入当代中国的社会建构之中。

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采取固农、发展农村的方针,是全面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着力点。中国的国情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绝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维护公平正义就成为现实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5%。据统计,全国农民工已超2亿人,加上外出经商的农民,形成一个庞大群体,占农村劳动力的很大比重。近年来,全国农民外出打工的人数以每年1千万的速度增长。应当承认,农民工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期历史发展的必然,农民工通过外出打工增加了收入,推动了城乡社会的发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工问题已经使“三农”问题增加为“四农”问题。农村发展缓慢、农民工无序流动、大城市膨胀化和负载压力过大等已成为我国当前迫切需要重视的与维护应有的社会秩序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也是实现社会正义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不同国家农村发展作横向比较,日韩两国农民工问题对我国应有借鉴意义。日本、韩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人口在城市就业谋生,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工业发展,但也带来了农村“空心化”问题。目前,上述两国由于农村劳动力急剧缩减,加之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农业生产现代化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注意防止发生韩国、日本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坚持适度推进,防止农村“空壳化”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现实问题。农民工漂在城市,而问题的根在农村。如何从本源上发展农村,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小城镇建设,持续推动农民自身的发展及新农村的发展,就成为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客观上分析,城市社区的农民工处于社会下层,但是,在农民工所流出的乡村社区中,与未流出的农民相比,他们是典型的精英群体。可以说,农民工现象是社会分层规律的一种体现。在确立有效的社会分工基础上,切实形成和谐有序的农民工流动,将分流与固本相结合,在承认城乡有别的前提下,缩小城乡差别。缩小这一差别的最终目的是建构合理的城乡格局,而不是实现城市与乡村同等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树立以人为本、以农为本的思想,是正义的原初要义——对秩序追求的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 [1] [古希腊]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53.
- [2] 李耀锋, 张永芳. 浅析《理想国》正义观思想及其现实性 [J]. 河西学院学报, 2008 (4): 10.
- [3] [美] 斯通普夫, 菲泽. 西方哲学史 [M]. 丁三东等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82-84.
- [4] [美] 埃德加·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 [M]. 张智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7.